

无怨无悔忆当年

●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编

无怨无悔忆当年

●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编

目 录

序言	李茂生	(1)
一、硝烟留痕	郑光拂	(3)
二、往事漫溯	张 定	(45)
三、抗美援朝回忆片断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	盛存义	(73)
四、难忘的父辈亲情		
——庆祝建党 80 周年，不负革命		
前辈期望	殷 袁	(85)
五、永远的追忆		
——1946 年秋至 1948 年秋燕京大学		
经历琐忆	李 宏	(96)
六、出版工作锻炼了我	王树敏	(106)
七、土改风云追记	陈 新	(111)
八、建党纪念忆尊师		
——缅怀郭影秋校长对我的教诲和		
影响	王俊义	(123)
九、受难·思考·欢乐		
——七十六自述	李 凌	(136)

序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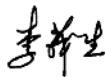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老共产党员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的成长历程，写出了一批长短不一的文章。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说，这些同志在职的时候为别人出了不少的书，我们现在也应该为他们出一本书。我和社长张树相同志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认为这对我们学习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很有裨益。于是就有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普通但又不同寻常的小书。

说她普通，一是因为作者都是我社离退休的普通共产党员。他们虽然或长或短都曾从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多数同志基本上是“为人作嫁”，没有时间著书立说，因而他们没有成为作家，亦非有影响的“自由撰稿人”。总之，没有多大名气。二是由于所写本人的经历，大多朴实无华。他们并没有直述亲自参与建树的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也没有用华丽的辞藻进行文学创作：在几十年的征途中，他们虽曾豪气干云，然而人们并未在本书中发现他们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们虽曾跋山涉水，但我们并不能在本书中见到险峻的山、苍凉的水；他们虽曾鹰击长空、砥柱中流，但我们在本书中也较少感受到当时的乱云飞渡、血雨腥风，或旋涡狂澜、浊浪排空；他们虽曾“三劳”（功劳、苦劳、疲劳）兼有，然而人们在本书中却见不到他们叫苦和邀功。说她不同寻常，则是指在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却能

够发现、能够体会或能够领悟到老一辈中国共产党党员所具有的崇高的科学信念、广袤的文明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坦荡的革命情怀、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尚情操。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社离退休干部党员中多数是中高级知识分子，而在我党的历史上，虽然总体上非常重视并很好地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但也有曲折，比如曾经在“左”的影响下，搞过一些运动，错整过一些同志，知识分子党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我社有些老党员也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我原来想，这些同志有些委屈、有些怨气，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现在做党委工作的同志，应该多关心他们，尽量为他们排忧解难。但这些老同志却大多能正确对待，他们没有提过分要求，他们经常讲的是，“比起为党的事业、为革命牺牲的战友，自己受到的那点委屈算什么！”因此，他们有的只是爱国爱党、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从本书中大家也可以体察到，这也使我非常感动。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曾经号召我们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还曾语重心长地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在当前更具有现实意义。从本书中我们看到，上述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基本上做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共产党员应该向他们学习。

是为序。



于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纪念日

一、硝烟留痕

郑光桦

作者的话

为纪念党的80周年诞辰，撰写了总题目为《硝烟留痕》的10篇回忆性文字，作为对党的生日献礼，也算是献出一点余热。

这10篇文字，几乎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和当时的见闻，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前，山东鲁南地区的人民和军队，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同敌、伪、顽各种反动势力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及取得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由于党的坚强领导，鲁南人民在斗争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这些精神是那一代革命者“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具体表现，也是共产党员党性的具体表现。党性，是完成任务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每个党员生生世世、时时刻刻不可或缺的行动指南，在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的今天，在反腐倡廉消除社会主义大厦“蛀虫”的斗争中，乃至在反对邪教组织“法轮功”李洪志之流的斗争中，党性和上述精神，仍然是强大而锐利的思想政治武器。

对于广大青年来说，老一辈讲述的故事中有很多思想品德优秀的人物及其事迹均值得学习和效法。再说，一个人在成长过程

中，需要全面的营养成分。而精神食粮，同样是不可少缺的，因为它影响着大脑指挥部，影响着思想和行为。如果有同志看到这些文字受到启发，那将是“余热生热”，令人皆大欢慰也哉。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这里记载的大多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难免有不确不当之处，敬请领导和读者批评指正。

家乡沦陷 父老乡亲惨遭日寇杀害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西南角，徐州北百余里，薛城南近四十里。东侧乃运河北一片小平原，西侧紧挨着津浦铁路和有名的微山湖。说它紧挨，是指离铁路线约一里多路，湖水上涨时离湖边三里多路的样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家乡一带虽然也有过战乱的影响，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太平宁静的。风光秀丽的微山湖，帆船来回，荷花飘香，渔民们用撒网、放鹰、飞叉、围堵多种方式捕鱼。说起幼年，至今在我脑海里浮现的仍是这幅画面。

卢沟桥的炮声震撼着祖国的大地。家乡也笼罩在一片惊恐、愤慨、大难来临的气氛中。家家户户都在商量着、议论着。有的说：“向哪儿逃？向哪儿躲？净等着死！”有的说：“不能等死，准备好刀子、剪子，到时候用牙咬，也咬死他几个！”有的说：“前些日子欢送中央军北去抗日，那些队伍是白吃饭的？”有的说：“大概打不过人家。”有的说：“听说老蒋不让打……”这种不安的议论，差不多早早晚晚都在进行。但是，尽管天天议论，总是始终表现恐慌、紧张而又无可奈何。1938年3月初，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滕县、临城（现为薛城）等北边的老百姓，潮水般地向南涌来。他们手提肩担，拖儿带女，哭天喊地，说什么“日本鬼子已经打过来啦，奸淫烧杀无恶不作”；“鬼子们单找年轻的妇女花姑娘，轮奸完用刺刀捅死”；“国民党的兵，闻风而

逃，一点也不抗日”。

本村的村民们，在这新情形的感染下也纷纷准备了担子、衣物、粮食，有的同北边逃过来的乡亲一道漫无目的地向南涌去。

我们一家，也随即加入逃难的人群。父亲挑着一担衣物，我挑着一点煎饼、咸菜，腿有残疾的母亲骑着毛驴，抱着发烧的四岁小妹，向台儿庄方向（我外婆家）逃去。走一段，歇一阵，再走一段，再歇一阵，我那可怜的小妹瑞兰就在逃难的路上离开了人间。我们全家边哭边走，走了一天半夜才狼狈地到了外婆家。

在外婆家住了大约近两个月的样子，战争的阴云突然降临。台儿庄战役不久，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打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全家一致认为无处可躲了，便决定“干脆回老家吧！”随即挑起担子向运河北老家奔去。

到了家门口，第一眼看到的是上锁的大门被打开了，门里边的八仙桌翻过来，四条腿还剩两条，碎玻璃、瓦片满地都是，饭锅里拉上了一泡屎。院子里的地窖被拆得乱七八糟。里边放的粮食、煎饼及细软物件，全被抢劫一空。我们全家人顿时陷入悲愤、绝望之中。个别没有逃远的邻居对我们说：“这都是鬼子和二鬼子（指日本侵略军和伪军）干的。”我们全家人听后，咬牙切齿地把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深深地记在心头。

当然，这只是铁蹄下悲惨生活的开始，更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仅就本人亲眼目睹的略记如下：

刚割完小麦，我村农民管二，在西南坡耙地。西南坡离铁路约半华里的样子，耙着耙着，叭地一枪，管二就倒下了。乡亲们聚来一看，地上流了一大摊血，原来管二的大腿被打断了。此时从铁路上下来几个日本兵，他们看着被打伤的管二，疯狂地大笑，并叽哩咕噜地连说带笑，人们猜测他们说的是：“瞄准还可以。”原来这些日本兵在铁路上以中国人为“靶子”，练习枪法

呢！管二受伤后在乡亲们的辅助下，几经辗转送到临城（现称薛城）治疗枪伤。真是冤家路窄，凑巧这处治疗的地方，原是日本侵略军设立的。护士、大夫及进进出出的多数是日本兵。给管二换药的是个日本女人，因为伤在大腿根不得不把内裤全部脱下，这样每次换药就必然碰到管二的生殖器。开始几天小护士比较收敛，后来越来越放肆了，由不停地摆弄到色情地挑逗，待生殖器勃起了她又骂管二：“你的心坏了坏了的，八格牙鲁。”老实巴交而伤痛在身的农民管二心里受到了巨大的屈辱，他心想：日本鬼子实在太可恨了，太不是人了……

有一天，一个日本军官来到这处诊所，正值那位女护士在用镊子慢慢敲打管二的生殖器，而且又被弄勃起了。日军军官进门一看，怒眼圆睁，刷地抽出军刀，二话不说就横砍过去。咔嚓一声，管二的生殖器被削掉了一段，鲜血喷涌而出，管二当即昏死过去。几天后，管二怀着满腔仇恨和屈辱离开了人间。全村大人小孩都知道管二是死在日本鬼子的枪、刀之下的，心里都埋藏下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的决心。

铁蹄下，父老乡亲们的灾难还在后头。

日本侵略军为了保护铁路运输的畅通，不仅在沿线设立了小型岗楼，还通过组织什么“新民会”、“维持会”等伪组织搞什么“站岗护路”活动，将沿线村庄美其名曰“爱护村”。“爱护村”本是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人、奴役中国人的一项黑招阴谋，可是，却口蜜腹剑地弄成为“中日亲善”、“皇恩浩荡”、“皇军特意关爱”等骗人的花招。

村民们的心里，普遍的都是反日、抗日的。个别的已经离开家乡参加抗日游击队。可绝大多数认为手无寸铁，想抗也抗不了，只好暂做顺民，忍气吞声以待后变。也有某些老年人、做小买卖的人，幻想着日本人真能“爱护”他们。

大约7月中下旬的样子，高粱已经长成青纱帐，忽听村北头

响起了哒哒哒的机枪声，村民们有的关门藏起来，有的向村外田野躲避，有的在街上探头探脑地观察动静。很快，一小队日本兵就随着“踏踏”的皮靴声进了村。街北头一家染坊店门口有只黄狗，被一阵“踏踏”的皮靴声惊扰了，它“汪汪”叫了两声，日本兵一举手——“啪”——小狗死了。这一枪更加惊动了全村，人人都认为这次要大难临头了。几个想躲没来得及的乡亲父老，如卖粥的郑良揽（他是郑姓家族辈分较长者，一般都叫他二老爷）、理发店的理发师魏召俭、卖鱼的徐守友、开小旅店的徐守田、没有职业的失学青年郑允棉和德高望重的中医先生郑允焕去求情。郑允焕手里举着一张日本人印发的布告（据看过布告的乡亲说，是日本水上挺进队指挥部的布告，内容大意是皇军武运长久、中日提携等），赶到最前头，低头躬腰举着布告，向日军求情致意。可是，惨无人性的日本兵，不仅毫不理睬这一套，反而怒眼圆睁大声吼骂：“八格牙鲁，你的坏了坏了的！”紧接着啪啪两声，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倒在血泊里，肠子流出来一摊。这时另五位求情的人一哄而散，可是一小队日本兵，全部举枪向跑开者开枪。开旅店的徐守田刚跑到一个墙角，一枪打中他头部，他站着，跷着一条腿，瞪着两只眼死在那里；郑允棉大约跑出六七步也被枪杀在路上；理发店的魏召俭赶快往店里跑，刚开开门，就被枪杀在门外……六位乡亲父老就这样全部被日本侵略军杀害。日本侵略者不是大肆宣传“中日亲善”吗？——这就是侵略者所谓的中日亲善！日本侵略者不是一直宣扬“武运长久”吗？——这就是侵略者的武运长久！日本侵略军不是热衷于组织所谓的“爱护村”吗？——这就是侵略者以最惨无人道的武士道精神强加给善良的、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的“爱护”！

但是，日本侵略军大概不懂得，中国有句古话，也可说有句古诗、古歌，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自己遭殃”。是的，乡亲们永远把这个仇恨记在心头。

第二天，有的青年就不声不响地加入了抗日游击队。

抗日游击队的若干片断和见闻

家乡沦陷后不久，抗日的烽火随即燃起。男女老少，山野田间，三五成群，拉帮结伙，许多乡亲先后投入了抗日的战场。在多义村被日本兵血洗后的第三天，铁路运兵车尾上的鬼子兵，硬被一位勇士从车上拉下来用菜刀活活砍死。这位勇士，就是村北8里路的一位游击战士。多义村有一群小孩，大的十多岁，小的八九岁，他们就是1937年在欢迎川军北上抗日标语上署名的“抗日娃娃队”。村里六位父老被鬼子兵枪杀后，这些少年幼小的心灵里总想着报仇雪恨！他们割草时，向日军岗楼扔过石头；也曾用石块袭击运送日本军队的火车；后来，他们在大路上挖了“陷马坑”（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方圆三尺深、上边用树枝伪装起来的小坑）。可是，就是这种小坑，半个多月后，真的把一个日本军官的洋马马腿陷断了。这群孩子知道后，心里无比的高兴。晚上操练游玩时唱道：“小朋友，大家一心，联合起来，打败日军，长大了都是革命军。”

说到抗日游击队，当时人们并不是很了解。后来参加游击队的越来越多，大家才知道得多了起来。开始只知道到处都有人拉游击，有小股的，有大股的；有有枪的，有无枪的；有的叫支队，有的叫大队，可以说如雨后春笋，也可以说形形色色，算起来不下二三十股。为什么方圆不过几十里路，会生长出这么多游击队呢？据我看来，一是谁都反对日本侵略，谁都不愿做“亡国奴”，谁都想高举抗日的旗帜，这是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政治思想基础；二是日本侵略军在占领滕县时遇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战斗结束后，不少枪支弹药流散民间。特别是台儿庄会战后，战场上丢失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民间原有的枪支也不少，这

就给“拉游击”准备了物资装备基础。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根据党中央《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先后组建了鲁南区党委、峰县县委，并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游击队中开展工作。原峰县（现为枣庄市）最老的中共党员叫朱道南（1927年入党，参加过广州起义和红军第四师，后被捕入狱。逃出监狱后辗转回到老家。朱道南的事迹在电影《大浪淘沙》中有过描述而且又是该影片脚本的作者）。1938年8月，中共鲁南特委指派朱道南为中共峰县县委委员。1931年入党的纪华（河南孟县人）被中组部派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后被特委指派到峰县一带开展工作，并委任为中共峰县县委书记。经过纪华、朱道南等一批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作，与运河以北的“国民党鲁南保安司令部特务旅”孙伯龙部，以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第二分团第五大队”邵剑秋部先后建立了紧密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孙、邵二人先后访问了中共鲁南特委，他们表示坚决合作抗击日寇。在运河以南地区，纪华同志通过朱道南同志与当时峰县6区刚被各村一致推举的“区长”孙斌全直接接触。孙斌全为人正直，经常与当地的恶霸地主作不调和的斗争，因而颇受当地各村的拥护。当地沦陷后，敌伪急令组织伪政权。而此时不远处的一位大恶霸地主龙传道正虎视眈眈地想掌握6区伪政权，因而附近各村诚心诚意推举孙斌全出面维持，孙斌全也就答应下来。纪华同志与他多次交谈，从抗日救亡匹夫有责，到共产党人要团结所有爱国人士共同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言真意切。孙斌全听了纪华同志的谈话，非常赞同，并当面向纪华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抗日；愿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而奋斗，并表示要把自己掌握的人枪交给共产党领导指挥。就这样，加上党组织很快指派一批共产党员加入6区的区队，这个区队很快成了共产党所掌握的抗日武装了。

经过党组织与有关人士的密切磋商，运河北与运河南的部队

通过互访，协同作战，很快汇成一体，加上中共苏皖特委指派共产党员陈诚一、胡大毅等与胡大毅的哥哥胡大勋（当地知名人士，参加过旧军队，当过上校参议）合作组织的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及其所属驻铜、滕、峄、邳四县边联办事处，支队所辖的运河大队（胡大毅任大队长，陈诚一任政委），这样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就在运河南北连成一片，形成日益壮大之势。

党中央为了增强山东抗战骨干力量，决定派 115 师入鲁。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代师长陈光同志于 1939 年率领 686 团、师直特务团等主力部队于八九两月先后进入鲁南。这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队伍，个个身经百战，真可谓所向无敌，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拔除了一些日伪据点及反动的封建地主武装，给我党我军开创山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重要的基础。罗荣桓政委经过调查研究，多次听取朱道南等同志的汇报，对运河南北我党所掌握的武装以及敌、伪、顽、匪等方面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于是决定同意组建运河支队的建议，并于 12 月份颁发了组建运河支队的命令。命令任命孙伯龙为支队长，朱道南为政治委员，邵剑秋为副支队长，胡大勋为参谋长，文立正为政治处主任。同时，抽派 10 余名红军干部到运河支队工作。这样，在我家乡就有了一支党所领导的，组织纪律性强的，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这支武装组建前后，与敌伪军浴血奋战多年，打过很多有名的战斗，如塘湖车站战斗，全歼日伪军 10 余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 10 余支；耿集地区战斗缴获甚多，俘虏敌人 300 多名；峄县城黄学战斗，战士们用 32 套刀法劈得敌伪尸横遍地，举手投降，缴获机枪两挺、步枪 50 多支，活捉敌人 80 名等等。因战斗次数很多，难以详细述说。

除战斗外，还有些比较新鲜甚至奇妙的故事，愿意告知大家。

先说，我参加抗日，是颇费周折的，也可以说是有惊有险

的。村里六父老被日本鬼子杀害后，我就打算到游击队去。我跟父母亲说了，父亲说，你没看到那么多中央军都抵挡不住，你一个小孩子出去不是白送死吗！我嘴说不走，可暗中仍在盘算。有一天我硬是溜了出去，朝东北角跑了二三十里，找了八九个庄子，可是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见到。没办法还是回家了。过了几天，我不甘心，又找机会溜出家去找游击队，但这次结果同第一次一样，还是没成功，只好半夜三更摸黑回到家。后来我向卖粉条的二舅打听他儿子（我的同学、表哥，学名龚承铎，现名龚震华，离休前任中共吉林市委统战部长）在哪里，二舅告诉我表哥在涧头集一带。这下我心里有了底。一天，我以看姥姥的名义去了涧头集。这次很顺当，见到了既是同学也是表哥的三表哥，以及中共峰县县委书记纪华。几天以后纪华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信里这样写道：震华介绍郑光甫（当时用名）去宣传队工作。并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在运北石头楼一带搞抗日宣传，你可去找他们。于是我赶紧向运北奔去。没钱坐船过河，我只好绕道从韩庄镇桥上走。我戴了顶红珠顶帽壳（介绍信就贴在帽壳里），可不巧桥上正是日本鬼子把守，他端着刺刀枪问我：“什么的干活？”我说：“我学生的干活，就是这个镇上的学生的干活。”这个鬼子摸了摸我身上，幸而没脱我的帽子。第二天，我到了石头楼一带。可是，在小山套里找了两三个庄子，都没找到表哥他们。我就赶忙再去涧头集。我买了馒头边走边吃，很快到了巨梁桥。走到河岸一看，渡船刚离岸调头，船上只坐了一个挎小篮的老太太。我赶忙喊了声：摆渡师傅！摆渡人看到岸上的我，即调头回来让我上了船。船到南岸，岸上有不少背着枪的便衣，他们看我同老太太一块儿，也没有盘问我，就放行了。我当时闪过一念头，想问问他们知不知道涧头集游击队的事。幸而未开口，就径直向涧头走去。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了游击队。见到了宣传队的负责人曹杰及表兄龚震华后，我把去运北找他们的情况

叙说了一遍。他们问：你从哪里过的河？我说：巨梁桥。这一回答，宣传队所有同志刷地一下脸色全白啦，霎时间全都目瞪口呆起来。我对这种惊讶的局面，既惊奇，又莫明其妙。接着龚震华问我：“在巨梁桥没人盘问你吗？”我说：有些背枪的人员，没有盘问我，我倒想问问他们与涧头集游击队熟不熟哩。龚震华马上说：你要是这么问他们，你就到不了这里了，就会被他们用刺刀捅死在闸口里。原来这里盘踞着以当地恶少刘善云为首的反动会道门红枪会。他与贾汪矿日特汉奸王亚平（自封为红枪会总队司令）勾结在一起，视抗日政府和八路军为死敌，不向抗日政府纳粮，不准八路军游击队进村等等。听后，我真有点后怕，心想如果不是与老太太一船过河，再多嘴打听游击队情况，那我的小命肯定呜呼哀哉也。

我们宣传队的工作，大部分是写标语，唱歌，宣传群众，向敌伪军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有时也演演戏。记得有位耍猴的民间艺人参加了游击队，猴子交给了宣传队。宣传队到运河北兄弟游击队搞宣传时，曾在阴平一带唱流亡三部曲，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时，我们宣传队员个个泪流满面，聚集的群众也不少擦眼抹泪，就连小猴子也低下头像是哭泣的样子。后来，由于我们行军打仗不便带着猴子，不久就让给群众喂养了。还有一次也很有意思。宣传队与部分游击队员一道唱歌。我们刚唱完“抗战的胜利快要来到啦！我们中国人快联合起来吧！我们的枪口瞄准了它，霹雳啪，霹雳啪，握紧枪向前杀……”一位近四十岁的游击队员站了出来。他为人很随和，好热闹，人缘关系好。他说：我唱一小段，唱不好别笑话。于是唱道：“十三个月，一年多，家里撇下个老婆，去年在家待我好，今年不知怎么着。”也巧，正唱到这里，他的老婆就从人群里钻进来，一面拥抱着他一面说：“这不来找你了吗！”这时引起了全场的一片欢笑。

有一次，我们在周营镇演戏，离周营三里路有个鬼子的岗楼，驻扎着一小队日本兵。游击队派了两个排，两挺轻机枪，在离村半里路的地方布下了火力网。而我们用了五个铁锅，用胳膊粗的棉花绳点着油灯，一阵锣鼓喧天后就开演了。记得当时演了一个“林中口哨”和一个“理发师”。后者是一个活报剧，说的是鬼子兵进来理发，被理发师戏弄了一番，最后用剃刀割断了鬼子的喉管。可当“鬼子兵”刚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穿的是地道的日本军服）。一游击队战士忽的一声窜上了舞台扑向了“鬼子”，幸而前台拉幕的同志连忙过去拉开，说明这是演戏，是表扬人民中的抗日精神的，才算解除了误会。据说，第二天日本兵来周营问群众：昨晚发生了什么事？群众说：“高兴大大的。”鬼子问：“有没有毛猴子？”群众说：“毛猴子也大大的，跑了跑了的。”弄得鬼子兵满脸无奈。

说到游击队的生活片断，有次小战斗颇有意思。我们游击队（中共峰县县委直接掌握的武装）在行军的路上，突然从东南方向飞跑过一队骑兵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迅速卧倒在豆地里，“哒哒哒”一梭子子弹打过去，这队骑兵就很快逃得无影无踪了。事后了解到，这支骑兵队原来是战前国民党峰县县政府的盐务官员刘少彭的队伍。他也打起了抗日的招牌，网罗了二十多人，封了十八个团长，自封为总团长。他虽然人少，没有几支枪，说不上战斗力。可他总认为自己是国民党的官，名牌，正统。而他却不知被他一阵射击的队伍，恰恰有他两个儿子在其中！大儿子刘亦夫（90年代病故。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校长）是共产党员，正在游击队里开办青训班。三儿子刘兴华（80年代初病故。曾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游击队任宣传队员。据说这场冲突后不久，刘亦夫曾相约与其父见面，爷俩儿都带着上了“顶膻火”的手枪，都打算万一谈“崩”了好动手防卫。在家庭饭桌上亦夫滔滔不绝地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像连珠炮般地说出来，根本没有其父刘少彭开口的机会，刘只好半点头半不点头地听着。据说，这次面谈后，刘少彭的观念大有转变，开始认为共产党确实英明。后来，纪华同志也个别做了他的工作。他就一步一步地向好的方面转化。加上共产党员张捷三同志（乃刘的表弟）的工作，影响着刘进一步成了我党我军的一位朋友。

抗日的洪流像是大浪淘沙，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得出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谁是“墙上草”，谁是“变色龙”。如曾经当过国民党峰县县党部常委、黄埔军校6期学生的孙伯龙就同我党合作得很好，后来先后被任命为运河支队支队长、鲁南军区副司令、国民党抗敌协会自卫军峰山支队支队长等职。孙伯龙同志于1942年1月在驻地毛楼被日伪军包围，在突围时中弹牺牲。他的乘骑被敌伪俘去后，始终不吃不喝，不让敌伪任何人骑，上一个，甩一个，敌伪对它毫无办法，只好将它枪杀。对此，爱国诗人孙倚亭曾咏诗《烈马行》，刊登在当时的《鲁南时报》上。所谓“变色龙”是指一些国民党的游击队，政治上变来变去。开始可能跟共产党游击队有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联络，可是，当着日伪军向其加压时，或者在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的推动下，他们就摇身一变，变为汉奸队或“摩擦专家”。如有名的汉奸头目张来余，就是在国民党复兴社头目黄禧堂五〇支队中任中队长而蜕变成汉奸的。如龙希贞，原属国民党山东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兼游击司令张里元的部下，曾一度主动率300人员参加我运河支队。可是，一个月后，他又带队伍叛逃到原国民党峰县县长那里当上了国民党峰县抗敌自卫总团团团长，成为反共最坚决的一员。后来随着日伪的治安强化和环境恶化，更进一步蜕化为日本侵略军的鹰犬：日伪峰县第八区区长兼警备第五大队队长（这个民族败类作恶多端，最终被我在攻克峰城时活捉，由我运河县政府在涧头集召开公审大会后枪决）。